

王立业 等 / 著

MODERN CHINESE WRITERS IN RUSSIA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 在俄罗斯



国际
研究
丛书
张西平 主编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Chinese
Cultur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王立业等著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 在俄罗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在俄罗斯 / 王立业等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8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9203-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26346号

- | | |
|-------|---|
| 书 名 |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在俄罗斯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ZUOJIA ZAI ELUOSI |
| 著作责任者 | 王立业 等著 |
| 责任编辑 | 李 哲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9203-7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up_russian@163.com |
| 电 话 |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9634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30印张 400千字 |
| |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78.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总 序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的文化。从秦至清两千年间,中国始终是亚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华文明强烈地影响着东亚国家。在19世纪以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中华文化圈。由此,中华文化圈成为与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共存的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丛书”的主旨就是探索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响,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给予学术的观照: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追踪中国文化典籍外传的历史与轨迹,梳理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人物和各种译本,研究各国汉学(中国学)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并通过对各国重要的汉学家、汉学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勾勒出世界主要国家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史。

严绍璦先生在谈到近三十年来的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意义时说:“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国际中国学(汉学)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它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入;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或许可以说,这是二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①就是说,对中国人文的

① 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5期,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6页。

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应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给予观照,打通中外,揭示中国文化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是本丛书的思想追求。

从知识论上来说,各国的汉学家在许多具体学科的研究上颇有建树,我们只要提一下以伯希和所代表的欧洲汉学家对西域和敦煌的研究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推进中国文化研究的价值,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因此,对域外汉学家所做的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应予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尊重。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因此,在不少中国文化研究的具体门类和学科上,在知识论的研究方面,最好的学者并不一定在中国,他们可能是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因此,系统地梳理各国的中国文化研究历史,如上面所讲的展开对域外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流派、人物的研究,是本丛书的基本学术追求。

但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毕竟发生在域外,对其的把握仅仅从知识论的角度加以认识仍显不够,我们应注意把握这些发生在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采取的方法论,注意从跨文化的角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加以把握和理解。注意其方法论,注意其新的学术视角,运用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揭示出隐藏在其“客观知识”背后的方法论,这正是我们国际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基本任务。

同时,注意“影响史”的研究。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领域。一般而论,传播史侧重于汉学(中国学),即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域外的中国形象首先是通过他们的研究和介绍才初步建立的;影响史或者说接受史则已经突破学术的侧面,因为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在许多国家仍是一个很偏僻的学科,它基本处在主流学术之外,或者处于学术的边缘,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影响和接受主要表现在主流的思想和文化界。但二者也很难截然分开,因为一旦中国文化的典籍被翻译成不同语言的文

本,所在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就可以阅读,就可以研究,他们不一定是汉学家,但同样可以做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可能不低于汉学家,特别是在创造自己的理论时。接受史和影响史也应成为我们从事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是我们对国际中国文化展开研究时的基本方法。

实际上汉学(中国学)的引入具有双向的意义,它不仅使学术转型中的中国本土学术界有了一个参考系,并为我们从旧的学术“范式”中走出,达到一种新的学术创新提供了一个思路,同时也对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们,对那些在京都、巴黎、哈佛的汉学家(中国学家)们提出了挑战,正像中国的学者必须认真地面对海外汉学(中国学)家的研究一样,他们也应该开始听听中国同行的意见。任继愈先生在世主编《国际汉学》时曾提出过,要通过正常的批评,纠正那种仿佛只要洋人讲的就没错的“殖民思想”,把对汉学(中国学)的引进和学术的批评统一起来,在一种平等的对话中商讨和研究,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学术态度。对国外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也不可盲从,正像对待所有的学术成果都不应盲从一样。这样讲,并不是否认这些汉学家在学术上的贡献,而是现在海外的汉学家们必须考虑到他们的著作如何面对中国读者,因为一旦他们的书被翻译成中文,他们的书就会成为中国本土学者的阅读、审视和批评的对象。对于那些做中国的学问而又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的汉学家来说,现在已经到了他们开始反思自己学术立场的时候了。而那些居高临下,对中国的学术指东道西,以教师爷身份出现的汉学家则可以退场了。

当我们面对大量涌进的国外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一方面,我们应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有一种多元的学术态度,不能有那种“画地为牢”,对汉学家研究的成果视而不见的态度。同时,也应考虑到这是在另一种学术传统中的“学问”,它有特有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不能拿来

就用,要做比较文化的批判性研究。随着汉学(中国学)的不断引入,对汉学著作做一种批判性研究和介绍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不同学术传统中的概念和方法的转化和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学术批判和反思才行。如何立足中国本土的学问,借鉴汉学的域外成果,从我们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创造出新的理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所在。

中国是汉学的故乡,对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中国学者自然有着国外学者不可替代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展开中国文化的研究开阔了我们的学术和文化视野,促进了我们观念和学术的发展,引进域外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是为了我们自身学术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万不可在介绍西方汉学(中国学)走马灯似的各类新理论、新方法时,我们自己看花了眼,真成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陪衬,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和反思的能力。因此,立足中国文化的立场,会通中外,打通古今,通过对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建设性的学术对话,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和文化的重建,这不仅成为本丛书的主要内容,也成为我们展开这一学术活动的根本目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对域外中国文化研究的称谓上仍无法完全统一,“汉学”或“中国学”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思路。为兼顾各方的学术立场,本丛书定名为“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丛书”。我们将海纳百川,欢迎海内外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为我们撰稿,或译,或著,我们都衷心地欢迎。

张西平

2017年5月27日

前 言

中俄两国乃文化大国,都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优秀的文化传统,两国在文化领域有许多值得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但长期以来,中俄文学领域的交流一直存在着不对等现象,这种不对等早在70年前就为郭沫若所痛感:“有一点使我们感觉遗憾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感觉遗憾的,就是中俄交流只是片面的。苏联文化给予我们的影响,真是浩浩荡荡像洪水一样向我们中国奔流,而我们中国的文化输到苏联方面的怎样呢?这,说起来真叫我们惭愧,两相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①直至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不可同日而语”依旧存在,表现为,国内研究界对俄罗斯文学“拿进来”的多,而将本国文学“送出去”的少;20世纪,尤其是上半叶,俄苏因为政治与文化的强势成为世界文学大国,向全世界表达着自己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中俄文学关系上,很长一段时间,俄罗斯文学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影响最大的域外文学,而在这种强势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实在是微乎其微,几近为零。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是,对俄罗斯作家作品的借鉴与吸收可谓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的一种惯性或曰天性,而迄今为止,不曾见到有哪一位俄罗斯作家对现当代中国作家有些许的借鉴与吸纳。造成的总体境况正如罗季奥诺夫所说:“中国人对俄罗斯文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学的

① 郭沫若:《再谈中苏文化之交流》,1942年5月30日所作的演讲。

认识”，时至21世纪，这位俄罗斯汉学家还在一次中国学术会议上坦言，“与政治经济的热度相比，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不能说是冷的，但至少是凉的。”提到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这位汉学家的话语里不失一种悲观论调：“翻译逆差明显，达到了20倍，俄罗斯的80后和90后根本就不知道当代中国文学是什么，他们只了解西方文学。”^①而且他们即便有所认知，也大都停留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认知，俄罗斯汉学的“描述也是离中国现实比较远的”（阿格诺索夫语）^②。中国文学之所以难以送至俄罗斯，其原因是多重的：

一是我们的国力国策长期没有跟上，热衷于经济建设的猛进而忽略了精神文化的建设，同时过于崇拜外国文化，过于强调用外国文化指导本国的文化建设，而缺乏将本国文化送出去的迫切意识，缺乏将中华自身的灿烂文化推向世界的民族自信。这一点，就连俄罗斯学者塔夫罗夫斯基都公正意识到，“中国对人类文明的文化、历史和物质贡献是不可胜数的。在17到18世纪，凡是由中国传来的事物几乎都在欧洲受到追捧。只是在经历了19世纪鸦片战争和20世纪初一系列屈辱事件后，中华文明才开始被西方小视。这使得不少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开始要求摒弃一切传统，即使是现在，很多中国历史学家仍然低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③

二是我们本国的翻译力量跟不上，翻译人才缺乏。现如今，我国的俄语招生缺乏高起点的生源，中学开设俄语的越来越少，大学所招的学生都是零起点，而入学后有限的时间全都用在学俄语和俄译汉上，而汉译俄几乎没机会学习和锻炼，可以说很多学校就没有教给学生汉译俄的意识，更无汉译俄技巧的培养——尤其是中国文学的汉译俄方面，故而能够胜任文学汉俄翻译的人少之又少。按理说，由中国

① 转引自吴学安：《中国文学翻译亟待告别“粗糙时代”》，《金融时报》，2014年12月5日。

② 《两国学者谈中俄人文交流合作》，见《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23日。

③ 摘自《听，汉学家这样讲中国故事》，《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1月27日05版。

译者来承担本国文学精品的翻译任务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它既可以确保原文理解没有偏差,译本选择避免片面,同时也可“防止国外译者或有意或无心的文化误读”^①,但是,我国的现实状况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心浮躁,大家无论是研究还是翻译都缺少定力,很少有人愿沉下心来熬制文学翻译精品,更不用说比较烦难的文学作品的汉译俄;在高校教师队伍中,作为学科,翻译远不如研究受到重视;在出版界,翻译稿酬一直上不去,故而很少有人舍得或能够花出精力来干这种吃力不讨好之事,而且出版社常常是不顾及译作对象而一味地催促成稿率和出版量,为了短期的经济效益,将一些粗制滥造之品急急推向国际文化市场;再同时,翻译者自身文化素质上不去,既不熟悉输出对象国的文化接受心理,又不能很好传达本国的文化本真,翻译出的作品“语言都是怪怪的,读者看过之后可能更觉得中国是个距离遥远的文化了”。^②(欧凯语)。就这一点说,在中国本土,存在着名著与名译相互寻找而不得的困境,由此,中国文学“送至”俄罗斯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中国文学向俄罗斯输送,光是译品的推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紧跟而上的中国文学研究。俄罗斯汉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决定了俄罗斯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阿格诺索夫指出,“俄罗斯汉学的一个问题是汉学家的人数太少,据俄罗斯科学院的资料,目前俄罗斯汉学家共有200人左右,但真正活跃的只有约50人,而且年龄偏大。而美国资料显示,美国有15000余名汉学家”。有限的人力还要面临着选择的茫然。对中国文学精品文化内涵、民族心理等认知上的雾里看花,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常常导致译者情绪化流露与宣泄。研究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影响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回想一下两国处于敌对状态的时

① 潘文国:《译人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中国翻译》,2004年第2期,第40—60页。

② 同上,第47页。

候,那时的俄罗斯汉学家要么完全政治化,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去谩骂中国,要么就是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古代文化”^①。故而,汉译俄中误解、误译、误评现象的时有发生,也就在所难免,中国现当代文学得不到应有的译介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理解俄罗斯汉学现有情况的基础上,在尊重俄罗斯汉学研究个性特征前提下,我们若能将现当代中国文学精品合乎俄罗斯需要地有选择投放,将中国本土文学研究强有力送出,对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份最直接和最有说服力的参照,甚至是引导、补充与丰富,可以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历史背景以及作品本身内涵的理解,帮助他们对现当代中国文学进行客观与正确认知,激发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以期促进俄罗斯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同时,通过认识俄罗斯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现状,与俄罗斯汉学家们交流沟通,我国本土文学研究也获得了一份来自俄罗斯的反观,对于我们的文化学术建设乃至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因为普众读者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我们就漠视甚或贬低俄罗斯几代汉学家为中国文学引入俄罗斯所付出的努力。俄国汉学的诞生,就是以18世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比丘林为首的俄国第一批汉学家翻译12卷本中国文化典籍,并写出质量较高的著作为标志的;中国文学作品走进俄罗斯的第一部是元人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这一剧作,俄译名为《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1759)。它是18世纪古典主义剧作家苏马罗科夫由伏尔泰的法文译本《中国孤儿》(1755)转译而得,迄今已有着近260年的历史。至19世纪上半期,俄国已经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汉学家,他们撰有大量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汉学专著。在长期得不到更好的本土文本的直接输入的情况下,俄罗斯汉学队伍凭借自己的微薄力量树起了欧洲第

^① 《两国学者谈中俄人文交流合作》,见《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23日。

二汉学大国的形象。

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中国文学作为汉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得以独立成科,其标志是B.П. 瓦西里耶夫(1818—1900)在欧洲第一次将中国文学列入大学课程,节译《诗经》《聊斋志异》,完整翻译唐人小说《李娃传》,并撰写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专著《中国文学史纲要》。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则首起于B.M. 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这位素被称为苏联汉学奠基人、苏联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史上的纪念碑人物,为中国文学在苏联的翻译和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身上体现了苏联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寻找”。早在60多年前他就提出要打破俄国读者对伟大的中国文学“还很陌生”的“这种迷途”,指出“当前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是使经过审慎选译的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丰富起来”,并表示要以这种方式推倒“中国墙”。^①他身体力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投注了近乎全部精力,以其对汉语精湛的翻译和科学的微观研究方法为后世称道。阿列克谢耶夫的翻译代表作,如司空图的《诗品》和陆机的《文赋》,尤其是蒲松龄的《聊斋》,不仅在苏联,就是在全世界也堪称最优秀的译作。与此同时,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研究以及对中国诗人与外国诗人的比较研究都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并对苏联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队伍的建设、优秀汉学人才的培养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十月革命与中国的五四运动爆发后,阿列克谢耶夫的高足B.A. 瓦西里耶夫(1899—1937)以其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1925—1929)的翻译出版揭开了俄罗斯现当代中国文学译介的第一页,同年,《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集》在莫斯科著名出版社“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鲁迅、郁达夫、滕固等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至此,中国当代小说以批量形式与苏联读者见面。接踵而至与读者见面的便

^① 转引自宋绍香:《前苏联学者论中国现代文学》,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是茅盾、老舍的长篇小说。至50、6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时代,中国文学在苏联的翻译与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一大批汉学家迅速成长,鲁迅、茅盾、老舍、巴金、郁达夫、叶圣陶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的作品得以出版发行,或单本,或结集,且发行量十分可观。当代汉学家罗季奥诺夫曾做过统计,截至20世纪末,鲁迅作品集的出版发行量146.3万册,老舍作品集约101.5万册,张天翼的约86.2万册,茅盾作品约68万册,巴金的约55.5万册,叶圣陶的约21万册,这一排行不仅代表了苏俄汉学家的文学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历史风云变幻的见证,更是俄罗斯不止一代汉学家为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翻译与传播的血汗拼搏和不朽劳绩的见证。与此同时,研究成果虽整体上逊色于翻译出版,但仍有一批有分量的关于鲁迅、茅盾、老舍、田汉等研究的专著相继问世,并伴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几乎关涉20世纪的所有重要作家,其间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远东问题》杂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专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提供了重要阵地。2004年起隔年召开的“远东文学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汇聚了当今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切主流话题,为中国文学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学术平台,也是20世纪末至今欧洲规模最大的定期学术论坛,它的每一次召开都是对中国文学国外研究的有力推动。更可贵的是每次研讨会都能生成学术价值很高的国际会议文集,有时候是一本,更多的情况下是两本或三本,为本学科研究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学术贡献。

俄罗斯中国文学译介250年,其间任凭世事沧桑多变,一直在顽强生存与发展着,并建立起了极富个性的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体系,使俄罗斯成为世界汉学研究大国。这一成就来之不易,一方面体现了俄苏汉学对中国文学引入与普及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见证了一大批汉学精英几十年如一日的呕心沥血。仅以20世纪为例,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也是俄罗斯繁荣灾难交错的百年,俄罗斯汉学与俄罗斯文学一同走过了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2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占据

主流,国内战争带来的饥荒动乱,使得本国的文学精品尚不能立足,中国文学研究也就更无从谈起;30年代大清洗与肃反扩大化,很多汉学家作品被封禁,汉学家本人遭镇压,即便存活也被剥夺了译介的机会与条件。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动荡让汉学家们无法专注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更不要说现代文学了。再者,30年代起,外国文学的出版要求必须与国家政治需求相符合,即政治订货,人为打造无产阶级文学和刻意寻求共产主义作家,故而进入汉学家视野的只有鲁迅、茅盾等少数左翼作家。另则,俄罗斯汉学界犯有欧洲汉学界的通病,即对中国文学研究重心在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翻译比例历来很低,再加上特殊时期,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就更是有所选择的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关系步入蜜月期,两国文学交往步入繁盛,一大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所谓的红色经典在苏联得到了翻译与研究,而且追风于两大主题,即抗美援朝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待苏联认定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风潮过后,一批不是以思想性取胜,而是以艺术性见长和反映平民百姓生活的作家的翻译才成了可能,所以才有了对老舍、巴金等作家的翻译与研究。50年代末,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两国间的文学交流也蒙上了浓重且逆反敌对的意识形态色彩,文化文学失却本真,即或有所译介,也已经完全被政治意图所取代,这是两国文学交往的冰封与逆反时代。“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中国的“伤痕文学”固然能唤起苏联人民对“解冻文学”的反思,但具有丰厚文学素养的苏联人民还是期待能读到具有文学价值而不是浓厚政治意识的作品,一批汉学家也开始着意寻找已经被弃置已久的中国经典文学,故而中国文学重译之风在俄罗斯汉学界曾一度盛行。但同时一个客观现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苏联读者包括研究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也已锐减。80年代中期起,苏联政局动荡,苏联文学转轨,作家们无心笔耕,汉学家们更是陷入迷惘,而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也呈萎缩之态,即便有所研究,也都转向至

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的研究。苏联解体以及由此而来的整个社会的动荡,尤其是经济凋敝使得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受到重创。国家投资于翻译中国文学名著的经济实力非常有限,由此直接影响中国文学在俄罗斯受众的数量和质量,且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队伍出现流失、老化、断代,汉语热带不来中国文学译介热,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愈益在窘境中彳亍而行。

20世纪的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从一度辉煌步入今日低谷,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同时,对于俄罗斯中国文学译介能达到现有成就,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知与激励。况且,对20世纪俄罗斯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状况予以研究,能获得多重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首先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文学送出难的问题,警醒我们珍惜现有的俄罗斯人的中国文学译介。通过对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一方面我们从中获得了参考和启迪,以补充、细化我们的本国文学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本土文化优势,“送出去”我们的研究,以纠正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家翻译选择的偏差(有时是特殊时期政治上的刻意偏差)、文本解读的错误与文化诠释的缺位,同时补足他们的研究疏漏,指导和敦促俄罗斯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另外,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作为汉学研究大国的俄罗斯,数百年的汉学研究已经使得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译介风格和理论体系,探究他们的中国文学译介,探明其审美观念和思想倾向,以此来反观和反哺我们的研究将会有诸多裨益。在将俄罗斯中国文学译介状况与成就介绍给国人的同时,将中国的本土文学研究输送给俄罗斯,是一项崭新的为当下国际文化交往所必需的文化互动。对于中俄学者来说,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共商文化对策与补救措施,为有着悠久传统和丰厚积淀的俄罗斯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东山再起做出我们的努力。

在研究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研究上,我国有一批优秀学者为此已经

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形成了坚实有力的俄罗斯汉学研究队伍。两大板块构成我国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之研究的主要状貌:

一、我国学者的研究。文学家与翻译家耿济之先生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以迪谟为笔名,于1936年在《申报周刊》第16期发表文章,题为《中国文学在苏联》,^①对自1917年起的苏联中国文学译介状况予以了综述,第一次就若干古典作品和当代名作的翻译质量做出了品评。“1949年前的鲁迅研究在苏联”这一议题在我国的俄罗斯汉学研究中一直热度不减,仅对苏联鲁迅研究予以综述的就有耿济之、萧三、曹靖华、戈宝权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几乎不曾中断(尽管文章与专著谈不上丰硕)。翻译家黄德嘉的文章《世界文学在苏联》(1954)以较多笔墨描述了中国文学在苏联的情况,重点介绍了以鲁迅为首的六位中国作家作品在苏出版发行的情况。温福安的《中国文学作品在苏联》^②对中国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都作了详尽评述,向国内读者介绍了众多苏联著名汉学家及其研究成果,对了解苏联50年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的80年代起,苏联加大了中国文学译介的力度,中国研究者也更加密切关注苏联的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最新动态。最著名的研究当属乐黛云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0》,其中包括多篇苏联汉学家的论文翻译。1983年,戈宝权发表了《论中俄文字之交》的文章,对中俄两国文学关系做了回顾,第一次双向思考了中国文学在俄苏和俄苏文学在中国的问题。李佑良、周士林合写的文章《60年代以来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翻译研究评述》对特定时段的研究状况的特点及其成因予以了综述,议题不仅涉及译著、论著与论文,还涵盖了所举行的学术活动,可谓资料翔实全面。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

① 第381—382页。

② 转引自《读书月报》第11期。

和1986年分别出版了《丁玲研究在国外》和《巴金研究在国外》，其中苏联部分占有很大篇幅。理然的文章《帝俄时期：从汉学到中国文学研究》对俄罗斯18—19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予以了探踪。王亚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2007）侧重探讨了中国文学在俄苏译介的历史成因及其研究特点。高莽的若干文章，如《老舍研究在苏联》《老舍先生和俄译者》以及《俄苏的萧红翻译与研究》议题集中，提供了诸多中俄文化名人往来交流的细节。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在此之前的研究多为概况简介与综述，抑或信息传播，或因资料欠缺，或因篇幅所限，普遍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和作者的学理阐述。

90年代以来的我国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之研究，有成就的学者当推李明滨、李逸津、张冰、宋绍香、阎国栋，诸位学者各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李明滨经过十五年打磨，两度以《中国文学在俄苏》（1990，2011）为书名出版专著，并于2015年在此基础上修改出版《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俄罗斯对中国古今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对俄苏重要汉学家及其译介成就给予评介，其间不仅在国内俄罗斯汉学研究界引起重大学术反响，也得到了俄罗斯汉学家的高度评价。李教授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中就文学方面专门研究了俄罗斯的中国古典文论、诗词、章回小说、戏曲以及现当代文学翻译与研究。著名汉学家热洛霍夫采夫对这些著作予以了一并评价，称其“给中国读者提供了最完整的信息”。李逸津的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研究可谓著述颇丰，从古到今，从文学到广义文化、文论、文史、古典戏曲、俗文学都有涉猎。其论文代表作有《俄罗斯中国俗文学研究述略》《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精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吸纳》以及《190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老舍研究》等。这些文章汇并成学术专著《两大邻国的心灵沟通——中俄文学交流百年回